

“武陵民族走廊”及其文化特征

黄 柏 权

内容提要：“武陵民族走廊”是指从中国江汉洞庭湖平原进入云贵高原的一条民族迁徙流动的通道，它的所属范围是历史上的武陵郡，今天的武陵地区。“武陵民族走廊”的文化是一种山地文化，具有历史悠久、神秘浪漫、崇尚武勇、多元融通的特点。

关键词：武陵民族走廊 范围 文化特征

一、“武陵民族走廊”的范围

“武陵民族走廊”是指从中国江汉洞庭湖平原进入云贵高原的一条民族迁徙流动的通道，历史上就是中原进入大西南的交通要道。费孝通先生在《武陵行》一文中指出：“这个山区（指武陵山）在历史巨浪不断冲击下实际上早已不再是个偏僻的世外桃源了，已成为从云贵高原向江汉平原开放的通道。这条多民族接触交流的走廊，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地貌还保持了各时期积淀的居民和他们原来的民族特点，另一方面又由于人口流动和融合，成了不同时期入山定居移民的一个民族熔炉。”^[1] 费孝通先生所指的就是“武陵民族走廊”，它位于东经 108—110°，北纬 28—30°的区域内，其间有一条由西南向东北走向的武陵山脉，其东边是雪峰山，西边是大娄山，北边是大巴山，南边是苗岭。“武陵民族走廊”所依托的武陵山脉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一地理单元内由西南到东北分布着乌江、沅水及其干流酉水、澧水、清江，这几条大河构成“武陵民族走廊”的主要通道。

“武陵民族走廊”的地理范围在历史上大致相当于武陵郡管辖的范围。“武陵”作为行政区的名称起始于汉代所设的武陵郡。《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在解释“武陵郡”时说：“汉置，治义陵，在今湖南溆浦县南三里。后汉移至临沅，在今湖南常德县西。隋初废，寻复置移今常德县治。唐置朗州，寻仍曰武陵郡，后又为朗州。宋曰朗州武陵郡，寻废。”^[2]《辞海》在释“武陵”词条时说：“郡名，汉高帝置。治所在义陵（今湖南溆浦南）。辖境相当今湖北长阳、五峰、鹤峰、来凤等县，湖南沅江流域以西，贵州东部及广西三江、龙胜等地。东汉移治临沅（今湖南常德市西）。

基金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武陵民族走廊多元文化互动与和谐社会发展研究》中期成果，课题编号：06BMZ028。

其后辖境逐渐缩小。隋开皇九年（589年）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朗州为武陵郡。境内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被称为“武陵蛮”^[3]。从《辞海》的解释可知，最初的武陵郡所辖范围很广，北达湖北的清江流域，南及广西北部的三江、龙胜，东起洞庭，西至贵州东部。

《汉书·地理志》载：“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属荆州，户三万四千一百七十七，口十八万五千七百八十五，县十三。”^[4]所辖县包括索（今湖南汉寿）、孱陵（今湖北公安）、临沅（今常德桃源）、沅陵（湖南沅陵）、潭成（今保靖南）、无阳（今芷江）、迁陵（今保靖）、酉阳（今永顺、保靖一带）、义陵（今溆浦）、垠山（今湖北长阳一带）、零阳（今慈利、石门一带）、充（今桑植）。《后汉书》的记载与《汉书》的记载大致相仿，略有不同。《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南阳二千一百里，十二城，户四万六千六百七十二，口二十五万九百一十三。”^[5]设有临沅（今湖南常德）、汉寿（今湖南常德东北）、孱陵（今湖北公安）、零阳（今湖南慈利）、充（今湖南桑植）、沅陵（今湖南沅陵西南）、辰阳（今湖南辰溪西）、酉阳（今湖南永顺东南）、迁陵（今湖南保靖东）、潭成（今湖南保靖南）、沅南（今湖南桃源）、作唐（今湖南安乡）。除“索”、“无阳”、“义陵”、“垠山”变为“汉寿”、“辰阳”、“沅甫”、“作唐”外，其它八县名称未变。《后汉书》不仅对武陵郡设置的具体时间，户口和管辖地域作了记载，还对武陵郡的历史渊源作了考察，武陵郡源于战国时所置的黔中郡。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在释“黔中郡”时说：“战国时楚地，古城在今湖南沅陵县西。《史记·秦纪》：‘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始皇时置郡，湖南旧辰州、常德、永顺、澧州诸府州，及贵州旧黎平、思南诸府皆其地。汉改黔中为武陵郡，即今湖南溆浦县。”^[6]所管辖的地域包括了沅水及其支流、乌江流域部分地区。《辞海》在释“黔中”辞条时说：“郡名，战国时楚置，后入秦。秦代治所在临沅（今湖南常德市），辖境相当今湖南沅水、澧水流域，湖北清江流域，四川黔江流域和贵州东北一部分。西汉改名武陵。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黔中郡。”^[7]两部辞书的解释稍有出入，《辞海》的解释更与实际情况相符。即是说武陵郡是由楚国所置黔中郡演变而来，其演化历程是楚黔中——秦黔中——汉武陵。秦黔中郡和汉武郡实际就是“武陵民族走廊”的范围。所以，“武陵民族走廊”是有其历史依据的。

从现实来看“武陵民族走廊”指的是湘、鄂、渝、黔边武陵地区，其范围包括湖南常德的一部分、张家界市、怀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宜昌市的长阳、五峰2个土家族自治县，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渝东南的石柱、彭水、酉阳、秀山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和黔江区；贵州铜仁地区，黔东南地区和遵义市一部分。整个国土面积10多万平方公里，

人口 2000 多万。在这块土地上聚居着土家、苗、侗、白、瑶、维吾尔、蒙古、汉等 30 多个民族。

总之，“武陵民族走廊”从地势上看是中国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的地带，从文化分区看是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交汇地，从现实状况看是中国中西结合部和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分水岭。文化互动和采借十分突出，是中国“民族走廊”中多元文化互动最具典型性的地带。在历史上，就是中原从洞庭湖沿沅江及其支流进入大西南的通道，是东西南北族群的交汇点。众多民族在这条走廊上迁徙、停留、互动、繁衍生息，创造了悠久的历史 and 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成为重要的“文化沉积带”，文化呈现出古老性、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

二、“武陵民族走廊”的文化特征

考古发掘证实，早在远古的时候“武陵民族走廊”就有人类活动，在“武陵民族走廊”的澧水、沅水、酉水、清江、乌江流域都发现了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直至夏、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文化之脉在武陵大山中一直生生不熄。经过“武陵民族走廊”历代族群的辛勤耕耘和创造，铸造了独具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我们可以称之为“武陵文化”。其文化具有如下特点：

1、独特自然环境孕育的山地文化

武陵山脉是云贵高原过渡到江汉平原的桥梁，武陵山区是中国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度地带，平均海拔 1000 米以上，境内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峡谷幽深。武陵地区是中国最典型的山区。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把中国各民族文化分为三种文化类型，即“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中原定居农业文化”。^[8]“武陵民族走廊”所处的自然环境铸造的文化是独具特色的山地文化。

从土家族的先民巴人开始，土家族就生活在亚热带大山区，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野生动植物繁多；岩溶地貌发育，溶洞甚多，岩石遍布，除山间少量的小盆地小台地外，都不能种植农作物；山高坡陡，森林密布，虎、豹、蛇等毒虫猛兽出没无常，也无从事大规模畜牧饲养业的条件；地处荒徼；行人罕至，也无舟楫和商业之利。特定的地理环境决定其经济生活既不能象大河流域的农业文化那样，能凭借河流的赠礼，用先进的农业工具和生产技术在疏松肥沃的冲击平原上索取粮食，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也不能象草原文化那样，依靠丰美的草原放牧牛羊骆驼，过着游动性的生活；更不能象海洋文化那样，凭舟楫之利，往来于世界各地，把事贸易或掠夺作为生存手段。然而，优越的自然环境给武陵人的生存提供了

天然保障，满山遍野的野生植物的根和果，可供猎取的众多的动物，成了武陵人生活的主要来源。所以，采集、狩猎曾长期成为武陵民族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出特有的山地特征。

据乾隆《永顺县志》载，五代以前武令山区仍是：“鸿蒙未辟”。常建在《空灵山应田叟》诗里写道：“湖南无村落，山舍乡黄茆；淳朴如太古，其人居鸟巢，牧童唱巴歌，野老亦献嘲。泊舟问溪口，言语皆哑咬。土俗不尚农，岂暇论肥硇？莫徭射禽兽，浮客烹鱼蛟”。这首诗，生动地反映了湘西在唐朝时仍处于采集和渔猎阶段。到五代，这一地区农业才发展起来，但仍“喜渔猎，不事商贾”^[9]宋初仍是“不通牛犁，惟伐木烧畲，以种五谷”，^[10]北宋中期才开始出现牛耕，明清以后才引进苞谷、红苕、马铃薯等适于当地种植的作物，直到“改土归流”前，武陵山许多地方采集、狩猎仍然是人民生活的重要来源。顾彩在《容美纪游》中记载了康熙年间容美土司辖区（今湖北恩施自治州鹤峰县）的经济生活状况，“其粮，以葛粉蕨粉和以盐豆贮袋中，水漉会之，或苦荞、大豆，虽有大米，留以待客，不敢食也。”^[11]此书还记载了狩猎的情况。从史料反映出，直到清初，武陵山许多地方仍以采集、渔猎和伐木烧畲的粗放农业为生存手段。

因为采集和狩猎不需要很先进的工具和技术，也少需要用智慧和技能与别人竞争，只要有力量和勇敢就可以从山中得到食物，这山取了取那山，生活带有稍许的游动性和不稳定性，但并无生存危机的发生，也不需要冒险，不会发生像游牧民族那样因天灾或战争被迫大规模迁徙；也不会像农业文明那样因水灾、旱灾、虫灾、土地压榨而出现生存危机，举行一次又一次为争得土地和粮食的暴动，或者在强权组织之下去修建浩大的水利和土木工程；更不会像海洋文明那样，远渡重洋，寻求新的生活空间，去征服、冒险和掠夺。只要不发生特别大的生态破坏（从冰川时期遗留下来的水杉等植物，到现在仍有灌乔木数千种以上，说明这一地区未发生过大的生态破坏的情况），山上动植物四季常有，随时可得，人口增多了，再向深山扩展。直到今天，武陵山区的优势仍是山地的生物多样性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山地给生活在武陵山的各族以安全感和自由性，赋予他们特有的秉赋和灵性，使这些民族在开发中国中部山区的时候创造了独特的民族文化。

武陵文化的山地特征不仅表现在经济生活上，而且融入到人们的精神生活中。由于盘瓠的子孙和“廩君蛮”的子孙都出生于山洞，所以武陵人对山有特殊的情感，武陵地区的世居民族普遍有崇拜山石的习俗，他们所崇拜的神有许多是山神，如梅山神、飞山公、山鬼等。武陵山民建房多依山面水，讲究向山和靠山，死后也注重坟墓的坐山和向山。民间文化中也不少了山的内容，武陵山区被誉为歌的海洋，所唱的歌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统称为山歌，山歌是武陵山人对山的颂歌，是他们的精神寄托，所以有山歌唱到：“高山山高高上天，山上

宝贝寻不完，永生永世和山恋，死也埋进山凹凹。”^[12]他们“不唱山歌不开怀”，“不唱山歌不说爱”。武陵山的土家族巫师梯玛在请神时，要请遍周围所有的山神。甚至流行于武陵山的摆手舞、鼓舞等也具山地民族的风格，其重心总落在脚上，反映出山地民族脚踏实地的品性。

2、历史悠久的地域文化

在历史上，由于中原文人的偏见，总把武陵地区看成是“蛮夷”之地，其文化也被视为草莽文化，登不了大雅之堂。如果我们对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进行清理就会发现，武陵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如在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发现的建始直立人，专家们经过对其地层进行古地磁测定、研究及对伴生动物群的分析，认为“建始直立人”的时代属早更新世，距今约200万年，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遗址^[13]。1956年在湖北长阳发现的“长阳人”，经过铀系法测定，其时代大约为距今19.5万年，属早期智人。1957年又出土一枚人类左下第二前臼齿化石及大熊猫、东方剑齿象等40多种哺乳动物化石^[14]。

从旧石器时代起，武陵地区的考古文化序列清晰可辨，完整无缺。如湖南石门县燕儿洞遗址出土的旧石器^[15]，沅水流域泸溪县白沙村田溪口发现的旧石器遗址^[16]，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在湖北巴东、秭归县内发现了二十多个旧石器地点^[17]。此外在川东、黔东北也有旧石器点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更为密集。从考古发掘看，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在武陵地区都有分布。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5年至2006年先后在乌江流域发掘了六枝老坡底新石器遗址群、沿河小河口新石器时代遗址、黑獭周遗址群、洪渡汉窑址群4处重要的新石器时期至汉代的古代遗址，这些遗址对研究乌江中上游早期人类活动有重要价值。^[18]2007年3—7月，考古专家在酉水首次发现大溪文化，清理出各种遗迹40余个，其中大溪时期墓葬7处，出土遗物标本500余件。填补了酉水文化序列中新石器时代的空白，丰富了酉水流域古代文化的内涵，把这一地区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推到了6000年前。^[19]

夏商周时期的武陵文化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如湖北清江流域的香炉石文化堆积共分7层，第7层距今4090±100年，第6层距今3520±130年，第5层为商代中晚期，第4层为商末至西周，第3层为东周时期。香炉石文化遗物丰富，包括石、骨、陶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以及兵器和装饰品，总计达到9240件，以甲骨最为引人注目，出土的大量卜甲、卜骨在长江以南最为丰富，特别是以鱼的鳃盖骨作材料，是前所未有的。出土的大量兽骨和鱼骨、陶网坠，在我国考古发现中是罕见的。专家初步认为香炉石文化为早期巴文化^[20]。在澧水流域发现了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40多处^[21]。在酉水流域发现商周文化遗址20多处^[22]。文化的地域特征十分明显。在三峡库区发现了相当于中原夏商周时期的巴人遗址168

处，其中有几处是巴人的经济文化中心。占地 10 万平方米的巫山县双堰塘巴人遗址是距今 3000 年前巴人的经济文化中心，占地 5 万平方米的云阳李家坝遗址是巴人的第二经济文化中心。^[23]城市的出现，表明当时这一带的文明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历史进入春秋战国以后，武陵地区的考古文化明显地出现了土著文化与楚文化、巴文化的交融现象，文化水准进一步提升。在鄂西南地区“相当于春秋战国阶段的文化遗址数量是很丰富的。其遗址中的文化内涵，总体上仍然是陶器为主线”“其物质文化的特征与主体当是楚文化为主。”^[24]在武陵山腹地的湘西地区，发掘出土了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舒向今先生认为这批墓葬实为战国晚期的典型土著民族的墓葬，属于五溪土著文化，绳纹圜底罐、平底罐、簋形器、圜底钵、假圈足壶便是这一时期五溪地区土著陶文化的代表；而五溪地区这一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一是青铜短剑，二是铜镞^[25]。在武陵山区，还发现了许多战国古城，特别是 2002 年考古工作者在酉水北岸发现的里耶古城，更是震惊了学术界。里耶古城面积约 2 万平方米，有城墙和护城河，该城初建于战国，废弃于汉初，城内出土了大量陶器、陶片和少量青铜器、铁器、玉器、秦半两。还发现了多口古井，在一号井中出土了近 3 万多枚简牍，文字达 30 多万，涉及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专家们认为：古城的发现，填补了湘西地区乃至全国秦汉时期古城，尤其是秦代古城考古的空白。尤其是秦简的发现，不仅找到秦代考古史上的里程碑式的珍贵材料，还为了解秦代社会历史提供了比以前广阔得多的全景式的思维空间，同时，它将改写和极大地填补《史记》、《汉书》中有关秦朝学术史^[26]。另外，湘西保留下来的溪州铜柱、老司城土司遗址、南方古长城，在恩施保留下来的唐崖土司遗址、容美土司遗址、柳州城等，都表明武陵文化的高度发达。

武陵地区不仅考古文化历史悠久，而且流动在民间的活态文化同样辉煌。世居在武陵山区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历史上都是有语言而无文字，民族历史和文化知识都用民族语言口耳相传，苗族的《古老话》，侗族的《创世歌》、《萨岁之歌》、瑶族的《盘王歌》、《密洛陀》、土家族的《梯玛歌》、《摆手歌》都如实地反映了人类的起源、民族的迁徙和社会生活情况，堪称创世史诗。另外，用民族语言传承的神话、故事和山歌浩如烟海，构成武陵文化云蒸霞蔚的文化景观；民族艺术丰富多彩，傩戏、茅谷斯、摆手舞、跳马等，形象地记录了武陵山先民早期的生产生活，具有活化石价值；民间手工艺精湛，土家族的织锦、木雕、刺绣，苗族的腊染、银饰，侗族的侗锦都是文化瑰宝；武陵山区民间科技发达，采丹有悠久的历史，很早就能用植物和矿物作染料，干栏建筑、鼓楼和风雨桥被誉为中国古建筑的杰作，苗医苗药名冠华夏，声播海外；文人文学也很发达，伟大诗人屈原的《九歌》、《桔颂》等作品得力于武陵文化的薰染，刘禹锡创作的竹枝词受到武陵民歌的影响。在明清时期武陵山区更是人材辈出，在容美（今湖北鹤峰）出现了连续七、八代的文人群体，在中华文坛上也是

少见的。彭秋潭、彭勇功、彭勇行等人的竹枝词既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可见，武陵地区虽然地处偏远，交通闭塞，但文化并不落后，它所孕育的文化同样辉煌灿烂，可以与中国其它地域文化相媲美。

3、巫雉为主要形式的神秘浪漫文化

武陵山一带是中国巫鬼文化的发源地，《世本》说：“巫咸始作巫。”又说：“巫咸以鸿术为帝尧之臣。”始作巫的“巫咸”在《山海经·大荒经》中第一次作了记载。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大荒经》是古代巴国的作品^[27]。前已论述，楚灭巴国后，巴人子孙大多流入五溪，自然带去了巫鬼文化。《汉书·地理志》对江汉地区的巫鬼文化作了记载，该书说：“(江汉)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失枝柱，颇与巴蜀同俗。”而江汉巫鬼文化最为盛行的是沅湘流域。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歌序》中写道：“《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每祠必作歌乐，鼓乐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作《九歌》之曲。”屈原的《九歌》、《山鬼》等篇明显地受沅湘巫鬼文化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武陵山盛行的神秘莫测的巫鬼文化，就不可能有屈原《九歌》等杰作。

巫鬼文化在武陵山民中代代相传，经久不衰。《魏书·南蛮传》记：“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鬢髻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是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信巫尚鬼，以歌舞乐诸神成为民众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湘楚之俗尚鬼，自古以然。”并说：“岁晚用巫者鸣锣击鼓，男作女妆，始则两人执手而舞，终则数人牵手而舞……亦随口唱歌，黎明时起，竟日通宵而散。”此种祭神娱神之舞还大量留存于武陵山民间，流行于武陵山区的雉戏和摆手舞就是印证。

明清时期，地方志对武陵山区的崇巫尚鬼习俗作了大量的记载，嘉靖《思南府志·风俗》卷一载：“蛮獠杂居，音语各异。……渐被华风，汉民尚朴，信巫屏医，击鼓迎客。”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风俗志》卷十九载：“州属多男巫，其女巫则谓之师娘。”乾隆《辰州府志·风俗》卷十四载：“信巫重鬼，所在皆然。”由此可知，明清时期，武陵地区巫风之盛行。

直到今天，武陵地区的巫鬼文化仍然渗透于百姓的精神生活中。富于神秘性的雉文化在武陵山区民间还大量的存在。如黔东南地区的雉堂戏，凤凰等地的雉戏，沅水流域的还雉愿和雉戏，土家族地区的梯玛活动，仍是民间喜闻乐见的活动。特别是武陵山区普遍存在的道士，在农村仍然有影响力，农村丧葬活动少不了他们的参与。另外，对大树、水井、石头等自然物的崇拜仍然有存留。

在历史上，武陵地区民间“信巫尚鬼”为巫师活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巫师所进行的

还愿、解结、超度、治病、问吉凶、择地等活动的神秘性反过来又强化了巫鬼文化的盛行。武陵地区的巫鬼文化常盛不衰，巫师在武陵文化传承中其地位也不断加强，既使巫鬼文化代代相传，也使本就神秘莫测的巫鬼文化更加神秘，无论是人生礼仪，还是民众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巫术。武陵山的神秘色彩至使山外人对武陵文化产生了神秘向往。我们可以从屈原、顾彩、沈从文等大家的作品中领略武陵文化的神秘意蕴。正如沈从文所说：“与人生活不可分，却又杂糅神性和魔性。湘西的传说与神话，无不古艳动人。同样差不多的还有很多。湘西的神秘，和民族性的特殊大有关系。历史上（楚）人的幻想情绪，必然孕育在这种环境中，方能滋长成为动人的诗歌。想保存它，同样需要这种环境。”^[28]这种神性、魔性、神秘性正是武陵文化的特征之一。

与神秘性密不可分的是武陵文化的浪漫色彩。武陵文化的浪漫是武陵人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孕育成长起来的，表现出武陵山人对生命意识的张扬，对人事的乐观豁达，对美好生活的寄托和期望，对大自然无限的热爱。武陵文化的浪漫可以从多方面表现出来。首先是对自然的顺应和尊重。武陵人热爱他们生活的大自然，陶渊明所描写的桃花源其实就是武陵人所追寻的乐土。武陵文化深受道教的影响，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武陵民间思想结合，使武陵人把追求自由自在的逍遥生活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他们遵循人生于自然而回归自然的生存法则，大凡对老人去世都是一件悲伤的事，但对于武陵山的土家人来说，老人死是“归山”，是走“顺头路”，所以给老人办丧事叫白喜，远乡亲邻都赶去，既不戴纱，也不默哀，而是唱歌跳舞，通宵达旦，很难感受悲伤的气氛。

4、崇尚武勇的英雄文化

武陵文化崇尚武勇的文化因子源远流长，传说中的“武陵蛮”的祖先盘瓠就是一位勇猛无比英雄的化身，正是他的勇猛才赢得高辛氏女儿的爱情。土家族先民巴人的勇猛同样为世人所知，传说中的巴人的祖先务相就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人，他“投剑独中”，“乘船独浮”，并战胜了盐神部落。这两位文化英雄的英勇行为载入正史，为后世所景仰。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崇尚武勇成为武陵山人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在武陵山世居的主体民族土家族、苗族、侗瑶族民间文化中，歌颂勇敢的民族精神成为一条主线贯穿在史诗、传说、神话、故事里，如土家族的《摆手歌》、苗族的《古老话》、侗族的《创世款》、瑶族的《盘王歌》都有许多对勇敢行为的描述和颂扬，在民间传说故事里，随处可寻武陵山各族人民与皇帝、土司王、客王、大自然英勇斗争的场景。在武陵山人所崇拜的神灵中多数是勇敢者的化身。如苗族人敬奉的“阿普苟尤”、“奶滚妈苟”，土家人敬奉的八部大神、田好汉、向老官人，武陵山人普遍敬奉的梅山神、四官神、白帝天王等。这些英雄，或为民族的生存繁衍作出了贡献，甚至牺牲自己，或是民间的守护神，是卫护人畜的战将。甚至流行于武陵山区的歌舞，如猴儿

鼓、芦笙舞、摆手舞等也铿锵有力，武勇无比。

武陵山人的武勇也表现在历次军事斗争中。武陵山人在历史上的武勇行为史不绝书。从蚩尤与黄帝大战，血洒疆场，巴人参加武王伐纣，歌舞以凛殷人，迫使殷人前徒倒戈开始，到清朝时苗族人民与清军的英勇搏斗，直到到近现代史上，武陵各族人民参加的历次革命斗争，武陵山各族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在这些斗争中，也使武陵山各族人民的天生劲勇的民族性格得以强化。在文献中，特别是在方志中，对武陵人“悍而直”的评价随处可见。文献在评价巴人时说：“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奋之则渝舞。”^[29]乾隆《贵州通志·地理·苗蛮》卷七载：“蛮人，惰耕作，喜渔猎，性犷悍，出入必带刀弩。”关于武陵山民崇武尚勇的性格，沈从文先生也多有描写，他说“至于我那地方的大人，用单刀、扁担在大街上决斗本不算回事。事情发生时，那些有小孩子在街上玩的母亲，只不过说：‘小杂种，站远一点，不要太近！’嘱咐小孩子稍稍站开点儿罢了。本地军人互相砍杀虽不出奇，行刺暗算却不作兴。这类善斗殴

的人物，有军营中人，有哥老会老么，有好打不平的闲汉，在当地另成一帮……”^[30]尚武文化氛围铸就了尚武好斗的人，尚武善战的人不仅传承着尚武精神，也强化着崇尚武勇的文化。

5、多民族创造的多元文化

武陵地区由于处于中国东西南北的交汇点上，历史上就是各种文化的聚汇地，加之多民族的创造，使武陵文化在五方杂处中不断实现着交汇和融通，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情貌。

武陵文化在孕育时期就具备了多元混合的特性，史前武陵地区就有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共生共存和相互交融，从而奠定了武陵文化多元共存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楚、秦势力向南方扩张，三苗、百越、巴人、楚人不断进入武陵山区，这些族群都带入了自身的文化成分，在与原来土著文化交融整合中形成了武陵文化的雏形，这种文化兼有濮文化、楚文化、巴文化的特征。秦汉统一后，武陵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统治，在这一地区建立了武陵郡、南郡，在武陵郡地域内，除了“武陵蛮”（有时也称“五溪蛮”）之外，还有廪君蛮、板楯蛮、濮僚等族群，说明其文化仍呈多元性。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全国性的民族大融合中，武陵地区人口仍有较大的流动，其中一支“蛮人”东迁形成“西阳蛮”。隋唐以后，虽然武陵地区人群相对稳定，但在唐末乌蛮的一支迁入武陵地区，融入当地民族之中。^[31]江西彭氏也迁人溪州，最后被当地土著所同化^[32]。宋末时，蒙古军队在从大西南包抄南宋王朝时，在大理征调大理国 20000 多人组成“寸白军”。“寸白军”转战江南，帮助元灭宋以后，一部分“寸白军”回到云南，另一部分则在谷均万、王鹏凯、钟千一、熊安国等的带领下溯长江而上，最后碾转进入洞庭湖西边的常德慈利一带，最后定居下来。在今

天的张家界市的桑植、永定区、慈利等地还生活着 10 多万白族，是中国第二大白族聚居区^[33]。明朝取代元朝后时，一方面对元朝的旧臣实行分化，另一方面也拉拢。明王朝任用维吾尔族大将哈勒的后裔八十作为开疆拓土和镇压南方“蛮夷”的先锋，后来把封为荆襄都督、定国镇南将军，命其镇守湖南辰州、常德一带，他的后裔在此定居下来。现在常德桃源县和常德市区仍有维吾尔族的聚居区^[34]。在明王朝对元的战争中，元朝镇南王的后裔被家臣所救，最后隐居在洞庭湖西边的松滋、澧县一带，繁衍了部姓蒙古族，今天在湘鄂交界的澧县、鹤峰等地还有蒙古族，鹤峰还成立了蒙古族村^[35]。这些民族的迁入的民族，与当地土家族、苗族、汉族和睦相处，相互学习，更是丰富了武陵文化的内容。

宋代以后，汉文化对武陵地区的渗透一天强似一天，所以武陵文化中的汉文化因子也十分明显，如大面积地使用汉语；接受儒家思想，建筑、服饰、器具大量使用汉区的技艺和样式；道教、佛教也大量渗透到这一地区。1840 年代以后，随着沅水、酉水、澧水、乌江与外界的贸易沟通，西方文化也开始传入这一地区，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也传入这一地区。1930 年代末期，大批内地的机关、学校、工厂迁到武陵地区，外来主流文化不断冲击和影响武陵文化。尽管如此，武陵文化仍未被汉文化所同化，相反，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为主体的武陵文化对传统的楚文化、巴文化、汉文化有选择的吸收，在保持自身山地特征的前提下，始终显示出文化的开放性、丰富性、多元性特征，这一文化特性正是武陵文化始终以强大的生命力存留于武陵大山的重要原因，以至成为中国的一条重要的文化沉积带。

三、结论

本文论及的“武陵民族走廊”是指的中国从江汉平原进入云贵高原，以至大西南的文化通道，这条走廊以武陵山脉为的核心，以清江、澧水、沅水及其干流酉水、乌江为进出通道。武陵民族走廊的地域范围是历史上的武陵郡，现今的武陵地区，面积有 10 多万平方公里，人口 2000 多万，是多民族的聚居区。

各民族在武陵民族走廊生息、繁衍的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这种文化是一种山地文化，具有历史悠久、神秘浪漫、崇尚武勇、多元融通的特点。

注释：

[1]费孝通《武陵行》，载《了望》1992 年 2 期。

[2]臧励稣《中国古今地名大辞》，第 507 页，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2 年。

- [3] 《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第14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
- [4] 《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上，岳麓书社，1994年。
- [5] 《后汉书.郡国四》卷三十二，第1497页，岳麓书社，1994年。
- [6] 臧励馥《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第1258页，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2年。
- [7] 《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第29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
- [8] 张岱年 方克立主编 《中国文化概论》，第11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9]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 [10] 《太平寰宇记·施州》。
- [11] 高润身《容美纪游注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 [12] 鹤峰县民歌集《万花楼》(内部资料)。
- [13] 郑绍华主编《建始人遗址》，科学出版社 2004年第一版
- [14] 吴汝康、吴新智主编《中国古人类遗址》，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 [15] 《石门燕儿洞旧石器遗址试掘》《湖南考古辑刊》第六辑。
- [16] 《泸溪县溪口旧石器地点》，《中国考古学年鉴》，第271页1992年。
- [17] 《中国文物报》1994年4月3日第1版。
- [18] 王宁《乌江北盘江水系新石器时代形成文化通道》，《贵州日报》2006年9月18日。
- [19] 《湘渝专家会诊酉水大溪文化 将继续发掘》，《重庆晚报》，2007年6月28日
- [20] 《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调查与试掘》，《江汉考古》1993年第10期。
- [21] 《桑植朱家台商代遗址调查与试掘》，《江汉考古》1989年第2期。
- [22] 刘长治《湖南湘西自治州境内酉水沿岸古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10期。
- [23] 夏斐等《留住三峡的文化血脉》，《光明日报》1997年11月5日。
- [24] 邓辉《土家族区域的考古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第144页。
- [25] 舒向今《五溪地区东周时期土著文化初探》，《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 [26] 《龙山报》2002年7月31日第1版，第2版。
- [27]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第15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 [28] 沈从文《沅陵人》载《沈从文淳朴人生》，第8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
- [29] 《舆地纪胜》卷175引《蜀都赋》。
- [30] 《沈从文散文选》，第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 [31] 王承尧《古代乌蛮与今天的土家族》，载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编《土家族历史讨论会文集》(内部资料)。
- [32] 彭秀枢《溪州彭土司来自江西考一兼与谭其骧教授商榷》，载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编《土

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内部资料)。

[33]戴楚洲《张家界白族的来源及其特征概述》，《武陵学刊》1996年4期。

[34]朱令臣、李定仁《湖南的维吾尔族》，《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3期。

[35]邓和平《湘鄂边一支蒙古人的来源与迁徙》，《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5期。

(三峡大学武陵民族研究院教授)